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郑仁在 黄俊杰 编

韩国江华阳明学研究论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郑仁在 黄俊杰 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韩国江华阳明学研究论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国江华阳明学研究论集/郑仁在,黄俊杰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1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ISBN 978-7-5617-5730-7

I. 韩… II. ①郑…②黄… III. 王守仁(1472~1528)—哲学思想—文集 IV. B248.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8752 号

本书原名《东亚文明研究丛书·韩国江华阳明学研究论集》,简体版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248 号

韩国江华阳明学研究论集

编 者 郑仁在 黄俊杰
项目编辑 钟明奇
文字编辑 韩秀丽
责任校对 邵 冰
封面设计 黄惠敏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a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0410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3.75
字 数 355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 4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5730-7/B·368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

总 序

《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是近年来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中的一件大事。这套丛书所收的都是台湾大学“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相关的同仁以将近十年的时间,所撰写或编辑的有关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的书籍。借此发行简体字版与广大读者见面的机会,我想对这套丛书的缘起与目标略作说明,以就教于读者。

这套丛书的出版有其长远的研究背景。1998年,我在当时台湾大学陈维昭校长及李嗣涔教务长(现任校长)大力支持下,规划并主持由台大所资助之“中国文化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1998-2000),整合台大文、法两学院教师近二十人,进行共同研究,获得良好成果。其后,我又负责主持“大学学术追求卓越计划”项目之一:“东亚近世儒学中的经典诠释传统研究计划”(2000-2004),结合台大校内、外学者专家进行研究,这项计划是当年“卓越计划”中唯一的人文领域计划。2002年起,以上述两计划为基础,我们研究团队又执行台大为“推动研究型大学整合计划”而设置之“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计划”(2002-2005)。经由前述三项计划之努力,终得累积丰硕之成果,陆续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印行,迄今已出版专书七十余种(仍在陆续出版中),依性质分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东亚文明研究资料丛刊》、《东亚文明研究书目丛刊》等三大系列。

现在我们推动中的台大“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计划”,建立在自1998年以来各阶段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东亚为研究之视野,以儒家经典为研究

之核心,以文化为研究之脉络,既宏观中西文化交流,又聚焦东亚各地文化之互动,并在上述脉络中探讨经典与价值理念之变迁及其展望。我们希望在 21 世纪文明对话新时代中,深入发掘东亚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东亚经典与文化研究上推陈出新,开创新局。

为了促进海峡两岸学术交流,我们将过去将近十年来在台湾大学已出版的有关儒学的专书,编为《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发行简体字版,与更广大的中文读者见面,应有其深刻之意义。在 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里,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主流思想,必然在文明对话的新时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一套丛书标示着我们复兴儒学传统,弘扬中华文化理想的初步实践。我们的愿景虽然恢宏,但我们的力量却极为有限,我希望广大的读者朋友,认同我们的志业,支持我们的用心,匡助我们的不足。

最后,这一套丛书之得以出版,除了感谢台湾大学李嗣涔校长的支持之外,我在此特别要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和他的同事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谢意。朱教授是朱子后人,对朱子学深有研究,提倡儒学研究不遗余力。朱教授主编《朱子全书》早已蜚声国内外,其有功于朱子学研究乃世所共见。朱教授大力促成《儒学与东亚文明研究丛书》的出版与发行,相信对海峡两岸学术交流必有极大之助益。我们也希望,能为未来儒学的发展,继续共同努力。

黄俊傑 谨识

2007 年 4 月 13 日

于台北台湾大学

序

黄俊杰*

《韩国江华阳明学研究论集》这部书,收集论文十七篇及附录三种,是汉语学术界第一部全面论述 18 世纪朝鲜阳明学者郑齐斗(字士仰,号霞谷。1649—1736,仁祖二十七年至英祖十二年)思想的专著,在东亚儒学研究中特别具有开拓新领域之意义,我愿在本书出版之际,略缀数语,说明本著出版的因缘。

郑齐斗出身于今日韩国江华岛,是 18 世纪朝鲜重要的阳明学者。郑齐斗的思想及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长期受到忽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朱子学在朝鲜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与影响力,而使阳明学受到掩盖,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郑齐斗的文集《霞谷集》一直迟到 20 世纪 70、80 年代才公开付梓所致。现在收录在本书中的论文,都是 2004 年 10 月 15 日至 16 日在韩国江华所举行的“江华阳明学派的定位与现代的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韩国阳明学会结合江华地方耆老及政府人士,召开这项研讨会,就江华地区而言,固然具有表彰乡梓先贤之深意;但就东亚儒学这个学术领域而言,则更具有究先圣之遗意、发潜德之幽光的学术意义,值得我们庆贺。

本书编者也是这次研讨会的主席郑仁在教授,是韩国西江大学哲学系教授,也是韩国阳明学会会长。郑先生与我订交超过三十年,远在上世纪 70 年代郑仁在兄在台湾读书时,我们就相知相惜,我们都醉心于孟子的思想世界,常一起讨论孟子学的相关问题。1977 年,仁在兄以《孟子心学之研究》为

* 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中研院文哲所合聘研究员。

题撰写的博士论文,我当时曾拜读全书,并一起讨论。遥想当年共学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而时光流逝已历三十载,诚令人为之悚然而惊!郑仁在教授在台湾完成博士学位返国任教,数十年来作育英才无数,并兼任学术行政工作,出任韩国阳明学会会长,推动阳明学研究不遗余力,贡献卓著。特别值得称道的是,郑仁在教授有心于搜集并出版韩国江华阳明学派未刊的珍本手稿,这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也是一种深具意义的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将来假以时日,江华阳明学派诸多未刊稿本若能一一问世,必定可以为东亚阳明学研究开拓新的视野,挖掘新的思想内涵,使我们对阳明学在朝鲜时代的发展,获得更新的了解。我非常高兴能与老友郑仁在教授一起编辑这部书的中文版,共同开拓东亚儒学史研究的一个新视野。

黃俊傑

于台大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2005年7月6日

导 论

郑仁在*

韩国的阳明学是20世纪才开始公开研究的。我们在区分现代阳明学和朝鲜时代的阳明学时,通常认为前者是由朴殷植(柏庵,1859—1925)和郑寅普(为堂,1893—1950)起始的,而后者是由郑齐斗(霞谷,1649—1736)创始的。当然,为堂的阳明学继承江华学的元祖——郑齐斗,故韩国现代阳明学亦由朝鲜时代传承而来,但所用文字不同而已。郑齐斗以前并非没有阳明学者,只是说在他之前没有形成具体体系的阳明学理论。韩国的阳明学从传入之初就遭到了朱子学的巨儒李滉(退溪,1501—1570)的批判,韩国儒学可以说是独尊朱学的。这种状况在郑齐斗之前,张维(溪谷,1587—1638)曾经提到。他提到在中国有正学、禅学、丹学等各家,既有学程、朱的,也有学陆氏的,而朝鲜则清一色为朱子学。

韩国的儒学大致可分为岭南学派和畿湖学派,如果细看其当时的国际学术关系便能一目了然。中国的朱子学在明朝时被罗钦顺(整庵,1465—1547)修正过,对朱子学有两种解释的可能性,亦即,以退溪为中心的岭南学派忠于原来的朱子学,而以栗谷为中心的畿湖学派则提倡修正朱子学。事实上,在朝鲜时期,比起王阳明的《传习录》,批判阳明并拥护朱子学的罗钦顺的《困知记》首先传入韩国,而且在知识界传播开来。从而,原来的朱子学和后来经罗钦顺修正过的朱子学之间形成了隔阂。朱子将理气与心性严格区分,理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而且将理属于形而上,将气属于形而

* 韩国西江大学校哲学系教授。

下。朱子继承程伊川的学说树立其体系。程伊川在称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解释中讲道：“所以一阴一阳之谓道”，将“所以”之道视为理，将阴阳视为气。但是，罗钦顺去除了“所以”二字，沿袭程明道的道亦器、器亦道之理以解释朱子。从而，他虽沿袭朱子将心、性严格区分，却又沿袭程明道不分道、器；不仅如此，也不分理、气。事实上，朝鲜学界中曾有过的有名的四端七情的论争也与此相关。退溪的互发说将理气视为二物。奇高峰（1527—1572）和栗谷李珥（1536—1584）将理气视为巧妙之合。李相殷（1905—1976）先生认为前者是四端七情的所从来之不同，理气分属，故称“对说”（主理论）。后者将七情中的“其善者”因而扬之四端，故称“因说”（主气论）。退溪和高峰的论争，是四端之道德情感与七情之一般情感是否相同的论争。理发、气发的问题，已涉及心体问题，此与阳明后学的“良知现成”的问题意识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这正是阳明学中体用同源“所具有的自发性和能动性”。退溪主张这种理发和理动，强调本体的自发性和能动性，结果同阳明学既有相通之处，却又持批判阳明学的态度。那么，退溪批判阳明学的根本理由为何？这与当时朝鲜王朝的现实状况有密切关系。朝鲜王朝推翻高丽王朝依靠抑佛崇儒的理念标榜道德政治，但当时执掌政权的勋旧势力帮助王子叛乱，篡夺世祖的权力，其道德性已经消失了。与此相反，士林们则不求高官，只潜心于研究学问。特别是几经士祸的士林派士气之沮丧，特别因赵光祖（1482—1519）的至治主义过于理想化以致改革失败，但其中所积累的学术力量和道学精神又靠士林派们重返朝廷。他们与勋旧派不同，标榜清廉的道德政治。从而，对他们来说，需要一种能够支撑现实政治的理论，此即圣学。退溪著《圣学十图》，栗谷著《圣学辑要》。事实上，朱子学从元朝一直到明朝，一直都是官学。朝鲜王朝亦以朱子学为官学，“金榜题名”这一科举的观念比起朱子学的义理来，其现世的成分太重，士林派们正苦于现实利益和理想的名分（道德）之间所产生的距离。明朝时，阳明学正是为了克服这种官学所产生的弊端而提出的。阳明学是与官学相对立的民学，官学是作为拥护中央集权体制的一环而产生的。事实上，这一点可以从元朝以朱子学来控制广阔的疆域也能看得出来。朝鲜王朝是中央集权体制，若依靠“良

知”而重视个人的自律判断,学者们无法接受对统治造成威胁的阳明学。但是,他们又无法回避阳明学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得不承认道德主体心的自律性。中宗之后,性理学的心学化现象验证了此事实。然而,朱子学的心学和阳明学的心学内容相差悬殊。退溪为了拥护圣学心法而批判阳明心学,重视程敏政为陈德秀(1178—1235)所著《心经》注释的《心经附注》,并写跋文,又著《心经附注释疑》以将朱子学的心学加以体系化。从而,韩国的阳明学从传入初期就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但与退溪展开论争的奇高峰,从三个方面批判了修正朱子学者罗钦顺的《困知记》。罗的主张为:(1)道心为性,人心为情;(2)理气为一物;(3)良知非天理。罗钦顺并不将阳明学的良知视为心体的天理,只将心的作用视为知觉的层次。对此,奇高峰认为良知便是天理,并批判《困知记》。从霞谷引用高峰批判罗钦顺这一点来看,高峰是将阳明学土著化的重要人物。

畿湖学派的巨儒李栗谷继承了与退溪论争过的奇高峰的因说(主气论),并发展了其哲学思想。他比较了徐花谭(1489—1546)和李退溪的学问,认为前者有自得之意,后者有因袭之味;然后,栗谷同奇高峰不同,但以罗钦顺的哲学为最高,这是与退溪批判罗钦顺不将理、气二分,而导致浑沦的错误正相反。这一点,可以从栗谷说退溪为追从朱子的因袭之味中看出来。栗谷对修正朱子学者——罗钦顺——的思想有好感,栗谷与成浑(1535—1584)经过四端七情论辩之后,更加强化了“因说”的地位。不仅如此,栗谷将朱子的理一分殊解释为“理通气局”,展现了韩国性理学的独特面貌。栗谷在《圣学辑要》中强调诚意为修己治人之本,这与退溪重视“居敬”是有所不同的。这种学风是帮助阳明学逐渐土著化的一片重要土壤。在栗谷的门下,始开韩国阳明学的郑齐斗的出现,并非偶然之事。但是,同一门下批判阳明学的朴世采(1631—1695)和韩元震(1682—1750),却更加拥护朱子学,这与当时朝鲜王朝经历了壬辰倭乱(1592—1598)和丙子胡乱(1636—1645)后所出现的现象有不可分的关系。两乱之后,朝鲜王朝几乎面临崩溃,为了解决这种危机,各界学者见解互异。东、西朋党以及“老论”、“少论”的出现,反映对现实问题的观点之差别,“老论”更严格地遵守朱子学的正

统,以调整社会秩序;“少论”则摸索新的出路,以求改革,解决现实问题。前者的代表为宋时烈(1607—1689),后者的代表为尹拯(1629—1714)。霞谷以强调务实之学的尹拯为师,而能够独自研究阳明学,当然尹拯并非赞成郑齐斗的阳明学研究,霞谷的其他师傅朴世采亦反对霞谷的阳明学研究,并著书《王阳明学辩》批判阳明学理论,那是因为当时不得不得受到执政派“老论”的牵制。韩元震作为宋时烈的再传弟子,从“老论”的立场著《王阳明集辩》以批判阳明学。尽管在韩国,阳明学遭受重重灾难,但霞谷还是坚守了阵地。郑齐斗的阳明学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以寻求真理的绝对的工夫论为基础形成的。郑齐斗承接了指责退溪工夫论的南彦经(1528—1594)的问题意识而批判退溪。

韩国最初的阳明学者南彦经,字时甫,花潭徐敬德之门人,他与李瑤一同受阳明学,并与洪仁佑(1515—1554)有过关于阳明学的书信往来,但其名不存。其《东冈文集》、《耻斋遗稿》也于日据时期(1910—1945)被日本人今西龙带走。从退溪文集所存的《答南时甫书》,我们仅知彦经受习阳明学说,李瑤从南彦经学阳明学而称论其优点于宣祖大王,使其亦颇悦于陆、王之学。李瑤在宣祖十六年五月,指摘东西朋党造成国家不安,并进而批评柳成龙、金孝元、金应南等“东人”,柳成龙(1542—1607)是退溪门人,明宗十三年(1558)得《阳明集》并加以批判。如此,在宣祖年间,对阳明学有两种见解:即受容派与辨斥派,当时明将魏时亮等建议阳明之文庙从祀,然终未采纳于朝鲜学界。对阳明学不断表明关心之意,丙子胡乱时,以现实意识接受阳明精神,活用于现实谈判者,乃是崔明吉(1586—1647),张维亦表认同。崔明吉主张讲和,因当时国力不能对抗清军,毫不自欺地以良知直视当时现实。

如上所述,因老论得势,阳明学被斥为异端邪说。老论的领袖宋时烈极为尊崇朱子学说,著《朱子言论同异考》,凡与朱子稍异,则谓之斯文乱贼,尽排斥之,被害者有尹美村、尹白湖、朴西溪,美村是成牛溪的外孙,尹拯的父亲白湖的学友,郑齐斗是美村之弟尹鸿举之婿。霞谷在党派上属“少论”,而继承溪谷,引用溪谷漫笔而著《耳目口鼻说》。郑齐斗又与迟川之孙崔锡鼎(1646—1715)敦笃友谊。由此可知,韩国阳明学自东冈至霞谷,绵绵不断,

继而踵之，至于霞谷乃成体系，而创造韩国阳明学。郑齐斗并不只是如实接受阳明学说而已，他并指摘其问题而收纳之，并研究阳明后学。郑齐斗已知阳明后学的良知之论争，他与友人闵诚斋论辨良知是否天理或知觉，闵诚斋援用罗钦顺说而主张良知是知觉，霞谷反驳而主张良知是天理，又作“良知体用图”，确立良知学的基础，并以此提高阳明学的地位。

郑齐斗一生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京居期（1649—1689）；第二期，安山期（1689—1709）；第三期，江华期（1709—1736）。在江华期间，霞谷传授其学于子孙及其门人，继其学者谓之江华学派。刘明钟（1925—2003）描述江华学派郑齐斗移到江华而讲阳明学，其子孙与德原君后裔、霞谷孙婿李匡明、申大羽移住于江华，以郑氏、李氏、申氏为中心，阳明学传来二百余年，他们以致良知之精神发展诗文、正音、史学、书艺等，又与实学提携，阐明民族主体性。以下介绍江华学派主要人物：

1. 李匡臣（恒斋，1700—1744），为郑齐斗作祭文的弟子，著有《拟朱王问答》，此书中他着眼于朱子和阳明的相似之处，这在他的《冰炭录》中也表现出来。并有笔写本《先薰》三卷四册。

2. 李匡师（圆峤，1705—1777），郑齐斗的友人，于英祖六年，父亲与叔父蒙叛逆之罪时，身遇家祸，由北至南流浪半世，但流浪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实践了由霞谷处所学到的实学。他评价霞谷的哲学为“去外诱，存实理，实学之要谛”。作为书法家，他创造了“圆峤体”，精通文艺美学。著有《圆峤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21册）。

3. 沈鎔（樗村，1685—1753），青松人，郑齐斗门人，他与李震炳、尹淳、尹璇等交游，并参与编纂霞谷文集。著有《樗村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第207—208册）。

4. 李匡吕（月严，1720—1783），从“少学于圆峤公”一语中可知，他受到了圆峤的影响。他的性灵主义诗文不拘俗套，重视创意。可以推断此为受到明朝袁中郎等公安派的影响。现遗留有他的文集《李参奉集》乾、坤二册四卷（《韩国文集丛刊》，第237册）。

5. 李肯翊（燃藜室，1736—1806），李匡师之子，自二十岁起转念国史研

究,著有史书《燃藜室记述》。他集中在史学研究中发现良知,并客观地记述主体性。

6. 李令翊(信斋,1738—1780),李匡师之子,李肯翊之弟。他在十八岁时跟随圆峤流配富宁,十九岁时又随圆峤流配湖南新芝岛,他一边侍奉圆峤,一边精研经书,他将忠信不欺视为其学问的根本,所以一生没有丝毫虚伪。现遗留有他的文集《信斋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52册)。

7. 申大羽(宛丘,1735—1809),为郑齐斗的孙婿,郑厚一的女婿,平山人。其高祖父申汝哲同崔锡鼎、朴世堂同属“少论”。他曾对厚一的孙子述仁言道:“汝之先祖圃隐宣导东方道学,最终以身殉国……仁为汝之家法”,如此,可知霞谷一家的家法。宛丘道:“学将以治心,不治心而治外,此俗学所以欺人自赋,害甚于不学”,以继承霞谷心学。现遗留有他的文集《宛丘遗集》(《韩国文集丛刊》,第251册)。

8. 李忠翊(椒园,1744—1816),虽为郑齐斗的弟子李匡明之子,但其生父匡县一生困苦。椒园十二岁时家族遭难,本家两个叔伯父都遭狱事,流配南北。他同信斋一起讲论良知学,曾云:“始之假也,岂不自知其假也,唯其久也,忘其始之假,而终身用之,而不疑焉耳”,并批判程、朱末学,主张需将一真无假视为学问的要旨。现遗留有他的文集《椒园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第255册)。

9. 郑东愈(玄同,1744—1808),年轻时曾向李匡吕拜学,他认为功利之学遗毒后世,道“盖学术一差,终归于循名,夫既以名为家计,则虽杀人得名,犹可为也……至如我朝中叶以来,则世道之彼此,祸福酷凡,况其名贤之为学术也。先以护党为道义,以我伐为事业,以是虚心,以此教人,则其辗转流毒之弊,当复如何哉!每见其声讨罪人也,心标举义理之名,构成森严之案,呜呼!孰知义理二字为后世杀人之刀斧也哉,思之甚痛”,并揭露了奴婢制度的不当。现遗留有他的文集《书永编》上、下册。

10. 申绰(石泉,1760—1828),为郑齐斗的孙婿宛丘的次子,他向郑齐斗父子求学后成为儒林的大师,霞谷离世后他移居江华岛翁逸里。他同宛丘一起编辑了《霞谷遗集》,于正祖八年撰述了《霞谷神道碑文》。石泉对《尚

书》古文学更感兴趣。他虽然同丁茶山重视的今文经学有所不同,但不惜多次赞扬丁茶山的学问成就。现遗留有他的文集《石泉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第279册)。

11. 郑文升(蕉泉,1788—1875),为郑齐斗的高孙,他特喜《诗》与《论语》,重视思无邪和慎独,将心视为根本。从而,他言道:“心和则形和,形和则气和,气和则天地之和应之,此所谓和气致祥也,反是则心形与气,俱失其和”,以强调心的重要性。但是他对实学也颇赞成,并著有《农书》,蕉泉将实心用于农民政策,将阳明学同实学联系起来。现遗留有他的文集《蕉泉遗稿》。

12. 郑箕锡(都正,1813—1889),为郑文升的儿子。他继承了家学并传授了良知之学,在其墓志铭中,李建昌言道:“孝慈顺详,施于有政,惓惓惟良”,但紧接着他又道:“公善气满面,发言简当,待人一出于诚惓”,所谓“简当”,指简易并恰当之意,同“诚惓”所表现之诚意有所不同。他的著述是否有所遗留,现在还未能确认。

13. 李勉伯(岱渊,1767—1830),为椒园之子,生李是远、李止远。著《海东恂史》,又有《岱渊遗稿》(《韩国文集丛刊》,第290册)。

14. 李是远(沙砚,1790—1866),为蕉园之孙,哲宗继位后,他历任工曹参判、吏曹判书等,后于丙寅洋扰时,与其弟李止远在江华自裁,得忠贞之名。李建昌认为他的学问“以真知笃行为本”,并且,从他的学问赞同祛华就实这一点上来说,也可以突出江华学的特征。现传闻家内遗留有他的文集《沙砚文稿》十卷,《古今书钞》、《野史钞》等,但未能经确认。

15. 李象学(士劝,1829—1888),为沙砚之子,其子有李建昌、李建升、李建冕等。根据李建昌的行状记载:“府尹少习于丁氏钦钦书,几成诵”,说明李象学极其喜好丁茶山的《钦钦新书》,从中也可以体现江华学与实学的关系。他强调“利禄非吾心也,及为政,公直疆敏,推实心,懋大体”,也为江华学的特征之一。

16. 李建昌(宁斋,1853—1898),别号明美堂,为李象学长子,继承其阳明学。十五岁登科,二十八岁担任书状官出使清朝。其学问的根基置于心

学,曾云:“舍心而为学,吾不知所谓道者,其在于瓦砾于,其在于虚空于”,他批判抛弃先圣的义理学,只追究文字学、名物度数的清朝朴学。他认为“吾身可以定理,而义理无定,吾心可以穷义理,而义理无穷。今谓吾身不能如古圣贤,而自弃于义理之外,则不可也”。他将一国之富强视为君心所定,并将党论的原因分析为八条。现遗留有著作《明美堂集》二十卷和《党议通略》、《读易随记》一卷等。

17. 李建升(耕斋,享年五十岁),按照阳明学的世界观,熟习新学以确保韩国之独立权。他于乙巳条约(1905)以后,发起爱国启蒙运动,并在江华陶村设立“启明义塾”,推进教育救国运动。《启明义塾趣旨书》之旨:(1)国民皆学;(2)务实;(3)心即事;(4)实心实事;(5)开广知识。以此来救国,其中有许多内容同阳明学是一脉相通的。

18. 金泽荣(沧江,1850—1927),出生于开城,以古文著名的文章家。在二十三岁时与李建昌会同,他不是纯粹的阳明学者,虽批评阳明格物说,也不完全同意朱子格物说。他强调诚意,以诚意为行之先,格物致知之意,已备明于此。故曾子立传,舍格物致知而只以诚意为首矣。著有《嵩阳耆旧传》二卷、《韶护堂诗文集》、《韶护堂续辑》、《大学古本私笺》一卷等。

19. 李建芳(兰谷,1861—1939),蕉园为其高祖,丙寅洋扰时自决的李止远为其祖父。他与从兄李建昌一起研磨学问,其门人郑寅普正是开辟现代阳明学之路的国学大师。曾言道:“所谓道与义者,未必真道义,而或出于假,而为名高,则适足以贼道而害义也,呜呼,道义之在人心未尝亡,而惟假者乱其真,则未易辨也,欲求其真,必先知其假,何以知其可,以其不合乎圣贤之道也。何以知其不合乎圣贤之道,以其不合乎人之情也。”他将天性原来的情感视为良知,憎恶虚假,追求真实,云:“不求其实,而假以为义,则悖理畔经,不可为训。”遗留有文集《兰谷存稿》十三卷。

20. 郑寅普(为堂,1893—1953),与朴殷植一起开启了现代韩国阳明学。他于1910年赴中国留学,专业为东洋学,继而组织同济社献身于光复运动。1918年回国后在延喜专门、梨花女专等学校讲授东洋学和国学,后又赴东亚日报社任论说委员,1948年光复后,就任国民大学长,1951年担任初任监察

委员长。1953年“六二五动乱”时被遣送到北韩,此后消息不明。他的著作有《詹园文存》、《阳明学演论》等,都收集到《詹园郑寅普全集》中。为堂的《阳明学演论》兼纳了阳明学史和朝鲜阳明学史,于1930年代在《东亚日报》上连载,旨在发扬自立、力行的精神。

现代韩国阳明学者根据《阳明学演论》以补充朝鲜时代的阳明学,最初出现的研究著作就是尹南汉(1922—1979)的《朝鲜时代阳明学研究》(集文堂,1982);继之为刘明钟的《韩国阳明学》(同和出版社,1983),以后改正补成《性理学与阳明学》(延世大学校出版部,1994)。为堂的阳明学,在延专时期传授于其学生闵泳珪(2005年卒),又传授于其女儿郑良婉(参看本书附录其特别演讲)。对江华学派的文学与思想,郑良婉与沈庆昊在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连续出刊(1995)。将由此传授的江华阳明学,韩国阳明学会继而承之、发扬光大,在江华开始国际学术之端。

十余年前(1994),金忠烈、刘明钟、金吉洛、宋在云、宋河璟、郑仁在、朴连洙、李明汉、宋锡准、金守中、刘哲浩等十余人发起提案,以创立韩国阳明学会(1995年4月8日)为宗旨而展开各种活动,并以十几年的活动和研究成果为基础,开办了此次国际大会。然韩国阳明学主力集中于研究郑齐斗的思想,以此次大会为契机,阳明学会的任务拓展为研究郑齐斗以后的江华阳明学者,整理收集未曾被发掘的资料。自从第二次江华阳明学国际学术大会开始,便已决定以研究霞谷的后学为主题,所以本次大会的重点放在阐明郑齐斗的思想上。

本书收录的论文是2004年10月15、16日在江华岛举行的江华阳明学国际学术大会中发表的论文以及后来追加的论文,本次国际大会成为使韩国阳明学发扬到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的重要契机。

一、宋锡准对韩国阳明学的形成和郑齐斗在韩国阳明学中所占的位置作出适当的总结。他的论文阐明阳明学之所以被排斥为异端,与其说是因为他自身内容的缺陷,不如说是起因于他所受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当时是朱子学的地位不可动摇的时期,阳明学持批判朱子学的态度,所以一传入便遭到排斥,尽管如此,但霞谷郑齐斗还是独创了韩国阳明学的一面,

此文中与郑寅普之分类法不同,将韩国的阳明学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与朝鲜后期实学思潮并驾齐驱的阳明学;第二,由传统的儒教转为天主教的学者们所形成的阳明学;第三,与旧韩末开化思想相关联所受用的阳明学。这三种阳明学共同基于“实心”。

二、李庆龙的论文将17世纪的后阳明学时期,以霞谷的核心思想和阳明后学进行比较,从而重新评价阳明学。中国在17世纪后期,阳明学处于停滞阶段,阳明学的优缺点也已经显现出来;与此相反,朝鲜的学界当中,以长时期对朱子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讨论朱子学理论的同时,自然产生了对阳明学的批判论议。郑齐斗不畏生命之忧研究阳明学,堪称江华学的开创者。郑齐斗的思想特征如下:(1)郑齐斗不是停留在研究阳明学的文字上,而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亲身体会的。(2)霞谷学中以慎独工夫为宗旨,以体悟性体成为圣人为目的。(3)郑齐斗的性体体悟工夫,可与江右阳明学者王时槐的透性研几相提并论,甚至可以同刘宗周的慎独论说相比。(4)通过郑齐斗对定性的论议,重新解释了天理长存和性体。正如郑寅普对其成果高度评价,解决了阳明学无善无恶的论争问题,终于平息了朝鲜性理学中对于理气的已发、未发的论争。这个成果在东亚学界中是值得高度评价的。(5)郑齐斗曾指责王畿等人的现成良知,具有任情纵欲的弊端,而主张敬慎工夫。(6)良知是性体而非情识这一主张,终结了朝鲜性理学界中将良知贬低为知觉的论争。霞谷学在17世纪后阳明学时期固然包括阳明及其后学,也为开辟朝鲜后期经世致用之实学奠定了学术基础。

三、吴震的论文,深度发掘了朝鲜阳明学的学术意义,他在论述意义的同时,也论述了郑齐斗的核心思想。郑齐斗在三十二岁以后的思想,明显地转向了阳明学,他曾在其师傅朴南溪面前阐明自己的心情。郑齐斗以孟子的“仁义内在”说解释阳明的“心理一”的立场,这是非常尖锐并富有洞察力的,从而郑齐斗对阳明学的理解不仅深刻,而且也全盘把握了中国儒学思想的历史和义理。霞谷指出,心即理的“理”具有物理和性理两种意义,将阳明没有明确阐明的地方进行了论述,进而体现了他的独创性,霞谷将良知解释为“生理”,这也是阳明未曾阐明的。霞谷对于阳明的独特理解,是和退溪以